

陈祖德的酒量和酒量可谓声名远播。我并不了解他的家族遗传基因。但是日本围棋界流行一个观点:酒量大,棋力才会强。棋力强的,酒量一定大。而陈祖德经常主动向我等晚辈宣讲这个观点,看得出他对此深信不疑。他还身体力行。晚饭之后一个多小时,溜达到三四百米开外的幸福大街小酒馆喝啤酒是他的最爱。通常他会点4升生啤,那并不是现在流行的“扎啤”,档次好像低得多,1升只需0.4元。下酒菜则是一小碟0.1元的水煮花生。有时候祖德会请上举重队的方杏根同饮,因为围棋队和举重队同属一个党支部管辖,队员之间就有交流。祖德即使独饮也乐在其中。

记得陈祖德与迟尚斌、胡之刚这两位足球巨星曾经在我的宿舍有过一次畅饮。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还没有去山西屯留干校,那就应当是1971年6、7月之前的事了。我作为“地主”,依稀记得准备了一些当年围棋队聚餐时喜欢的酒菜——素什锦——从王府井素食店买来的,主要是凉拌豆制品。而那天喝的许多酒,基本

## 陈祖德与迟尚斌

华以刚

## 往事如海市

张叶

翻开倒篋的儿子无意中翻到一幅水墨山水,画上高山磅礴,松涛暗涌,山林深处一座小屋却泛出熨熨的光芒。“妈妈,这是你画的?”儿子匪夷所思地问我,一个初长成的少年就那样久久地站在落地窗前的斜阳里,忽而愧疚:“妈妈,如果没有我,你是不是早已成了画家或作家?”我的心倏地一疼,往事遥远,本心朦胧似被风干的花瓣包裹的花蕊,不可触碰。但再美的梦想,也不可抢夺亲人的位置,我灿烂地笑道:“这世上极少有人可以幸运地从事最喜欢的工作,更不会后悔为家人所付出的一切。”儿子走过来抱我:“妈妈,谢谢你。”我说:“也谢谢你,让我变得更成熟与有担当。”

想当年,那些风一般的日子,在操场的草坪上数星星,和文学社团的“诗人”们聊海角天涯的话题,听音乐社团的吉他手唱比昂乐队的摇滚,在教学楼下跳墨尔本鬼步……有个蒙古的师弟,长相神似“F4”里的言承旭,一天夜晚在操场找到我倾诉:“姐,我失恋了,我准备放假去浪迹天涯。”我清晰记得他的诗都很押韵,多数是七律,而且每首诗都带有“剑”“风”之类的字眼。临毕业的时候,这位师弟又跟我说,他的理想改了,不当诗人了,要“从政”,要改变社会和国家。而若干年后,校友传来他的消息,他带着自己的爱人,在外地开了一家“草原肥羊火锅城”,说是“城”,其实里面可以容纳十几张桌子罢了,他壮硕的两个儿子,在客人间跑来跑去。有些个夜里,我仰望星空时,想到顾城那句“我把石头还给石头”,我不知道,师弟还写不写诗,是不是也有一些怦然心动的瞬间,被曾经的梦想美到心碎。

就像我,在少女时代,是个背着画板到处写生的小文青。一个人去夜晚的电影院,一个人步行去书店,总是穿着要么淑女、要么古怪的服装。而若干年后,我在厨房抄着锅铲上演“皮影戏”时,因辅导作业而抓狂时,渐渐知道,可能每个女孩子,都会经历从仙女飘落凡间的历程。这长达一生的光束,像塑造一尊瓷器,让人逐步走向莹润、成熟与稳妥。不必嗟叹是为谁而牺牲,这只是我们理性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多半是因为爱与责任。而那本心,海市蜃楼般悬挂在记忆的烟海里,在生命的启航处,总是一幅极美的景致。

上是他们三位自带的。除我之外,在场个个酒量了得,彼此就进一步获得良性激励,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气氛热烈。三位喝酒还有一个特点,特别清楚自己到底喝了多少,绝不夸口谎报。不像有些酒局,明明白白的一瓶酒,经过酒友分别自报后,其总和会变成两瓶甚至更多。陈祖德更是将一整瓶金全大曲(不见得是他特别中意,可能当时相对便宜)揽在手下承包了。还有一瓶绍兴花雕酒,只有陈祖德一个人比较喜欢,其他人几乎没有较。现场还有两瓶前述的0.4元的生啤,用热水瓶打来的。年轻人相聚兴致很高,终于两位足球大咖——开始呕吐,不久我也喝倒了。酒友们都知道,喝混酒最容易醉。好个陈祖德,整瓶白酒,几乎一瓶黄酒,外加啤酒忽略不计,酒量太厉害了。当三个伙伴纷纷倒下的时候,他无怨无悔,默默地打扫战场。这时候酒量的大小简直就不值得评论,应当弘扬的是祖德的酒德了。

有人问我,你们几个如此畅饮,话题一定很多吧。的确很多,天南海北的。只是毕竟时光流逝,印象模糊了。但是有一件事特别难忘:足球队员训练或者比赛累趴下,恨不得倒床就能睡着的时候,大家绝对不会忘记的是,首先要擦干净,擦亮足球鞋,并且虔诚地挂在醒目之处。足球鞋乃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大咖感兴趣的是,围棋人有什么癖好呢?我大致这么回答的:棋盘是训练和比赛的必备器材,除了少数收藏或者私用之外,棋盘属于公共用品。棋手爱护棋盘天经地义,是敬畏围棋的自然流露。在日本的重大比赛中,双方入座后,下手(执黑棋的一方)要使用主办方事先准备好的抹布,虔诚而象征性地擦拭棋盘。这才开始对局。而我注意到,个别国人往往将热水杯随意放在棋盘上,拿走杯子的时候,就会在棋盘上留下印痕,这面棋盘就此永远破而无法复原。如此不尊重围棋人的感受,不爱护公物,

我大概是在职的年纪最大的班主任之一了,今年实足58岁,还有不到两年退休,担任高三一个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级是重新组合的一个班级,按规定暑假回家访三分之一同学,但我自己力求做到百分之百。为什么呢?因为班级中有一部分是我原来班级的同学,但当初我对他们家访的时候,是他们刚刚从初中升入我们学校,主要了解他们初中的情况以及对高中学习的打算,等高一升入高二的时候,赶上疫情,不能实地家访,现在升入高三了,我需要将他们在校的情况向家长做个反馈,家长也把他们在家的表现与我沟通。但更多的是我新接手的学生,我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需要通过家访掌握。

可是还是有疫情。先是云南,后来湖南张家界,后来南京、扬州,后来河南郑州、商丘,再后来上海浦东、松江也有少量病例。我在群里征求家长们的意见说,如果有疫情方面的顾虑不便登门家访的,可以与我私信。家长纷纷表示“欢迎李老师家访”,因此除了两位表示出于疫情考虑不便家访外,班级总共32位同学,我实地家访了30家。

我们学校特殊,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最远的在金山。我把学生分好片,看住在青浦城区的有多少同学,利用晚上家长下班的时候去;住在青浦之外的,我一般是跟着地铁走(我不会开车),把学生分成浦东块,

我不知道还该怎么说。迟尚斌给围棋界留下的一大遗产,恐怕知之者甚少。那时候他和游泳队的小兄弟们经常玩一种扑克牌,起名叫“火箭”。其显著的特点是:一张A加上两张4组成的三张组合牌称为“火箭”,是牌局中老大。聂卫平打了九把之后,觉得规则还算有趣,但是使用一副牌打,变化太少,就试着增加牌。两副牌、三副牌、直到四副,终于定形。四个人打团体对抗,意味着每个人手上拿着整整一副牌。第二,以前的“火箭”不分大小,以先打出的火箭为大。聂卫平在这里使用桥牌概念进行改革:火箭首先比A的花色,以黑桃、红桃、方片、草花的顺序确定大小。接着再比4的花色,以两张黑桃4……直至两张草花4的顺序确定大小。例如黑桃A配两张黑桃4就是火箭中的老大,戏称“纯火”。除

了纯火之外的火箭都叫“杂火”。显然草花A配两张草花4就是最小的杂火。第三,火箭打得多了,聂卫平还总结出:以出现概率来确定大小才是最合理的。例如3张相同的牌,可以当作“炸弹”,那么相同牌越多的炸弹,出现概率必然越高,就愈加应当体现其价值。所以就规定6张相同牌的炸弹,比杂火大,但是比纯火小。而7张相同牌的炸弹比纯火大。第四,聂卫平还特别强调计分制:扑克牌5记5分,10记10分,K记10分。这样每一门花色计25分,一副牌计100分,4副牌共计400分。最终团体得分分输赢。

火箭在围棋队流行开来之后,聂卫平就称迟尚斌为“老火”。直到现在,火箭仍然是围棋队日常的休闲选项之一。听聂卫平说过笔者在火箭改良中发挥过作用,乃是他自谦之词,不必认真的。

## 一位老教师的暑假

李新

黄浦、虹口、杨浦、宝山块,静安、普陀、长宁块,徐汇、闵行块,松江块,金山块。但也有经验出问题的时候,比如一位同学住在沪青平公路上,我依经验觉得金地小区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乘公交两三站就可到,谁知道是反方向,离学校40分钟车程;还有一家住在漕宝路,我依经验觉得在桂林公园附近,从上车乘公交一站就可抵达,谁知道漕宝路长着呢,到七宝也是漕宝路,这家住在闵行区。青浦以外的,我都是利用双休日家长在家时。因此,暑假中的双休日,我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家长说,都说教师有两个假期,李老师你看你假期还在家访。社会上有很多人对老师的误解可能就是教师有两个假期,但我的这个暑假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刚放假,接到教研员的一个任务,让我给高三语文老师做个培训讲座,分配给我的是选择性必修下册第四单元,这个单元是“科学论著研习”单元,所选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证明》,我读了十遍也没见得读懂;《宇宙的边界》《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两篇文章,也是科学性很强的文章,我这个当年的理科差生,读这样的文章真是痛煞我也!为了这不足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我足足准备了半个月,自己还觉得留有遗憾。另外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布置的任务,这届高三是使用全国

统编新教材的第一届,也是采用新的课程标准的第一届,语文到底怎么考?不知道。没考纲了,只有课程标准,没有现成的试题可以参照,我只好依据教材开发出点东西。

正当手头事稍微告一段落,突然接到学校通知,紧急开会,第二天紧急召开家长会——学生接种新冠疫苗。又是统计集中接种的、分散接种的、十八岁以上接种的、有禁忌症的、在家休学学生的接种情况,陪学生集中接种,统计分散接种学生的预约情况,接种好之后三天回访,看有没有异常反应,一天一报,忙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

等这些都忙完,开学了。一个看起来漫长的暑假匆匆忙忙结束了!到浦东去家访时顺便去看望原先单位在家养病的老校长。几年没见面,也只能说好交谈限定在五分钟内,因为我下一站要赶到陆家浜路西藏南路去。老校长给我发了个微信:“这么热的天,你从青浦赶到浦东家访,为你的敬业爱生精神大大地点赞!”当有家长说“李老师,来不来家访,学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感访作为一个老师的价值。那天,当我第一次乘上小火车,踏上金山的土地,我感觉到风光无限美好。



边看边聊

法语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归于道山已经一年了。去年此时,我正在美国佐治亚大学访学,猝然看到微信群的讣闻,刹那间有些恍惚,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天后来做了些什么,我已经淡忘了,只记得黎明时分,放在抽屉里的三包骆驼香烟只剩下了空盒。

当时的寓所毗邻一间教堂。薄暮之时,祈祷的钟声照例透进窗台。在过量尼古丁的麻痹之下,意识似乎有些迷离,隐约之间,少年时阅读《巴黎圣母院》的体验又复查而来。窗外那仿佛是卡西莫多与生命相冲击的鼓荡钟声,和先生离世的噩耗交相盘旋,“如三生影影须臾,听一声楼钟亘古寒”,留我沉陷于直击灵魂的巨大悲怆。

《巴黎圣母院》是我与郑先生在书中的初次邂逅。后来的求学生涯中,郑克鲁这个名字一次次出现在案头书册的封面上。我渐渐得知,郑先生出身名门,系清末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的曾孙。他师承作家、翻译家李健吾,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事业。《悲惨世界》《茶花女》《红与黑》《海底两万里》……等1700万字的半壁法国文学,几乎都是郑先生以一肩之力“扛”来。翻译之余,他还编撰了《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等厚重的研究专著。这般成就的大家,大翻译家,我们外语系的学生素来敬若神明。读研后,我师从朱振武教授学习英语文学与翻译学,然后惊喜地发现,自己竟机缘巧合地成为这位陪伴我整个青春阅读生命的长者的再传弟子!如此缘分,大约只在冥冥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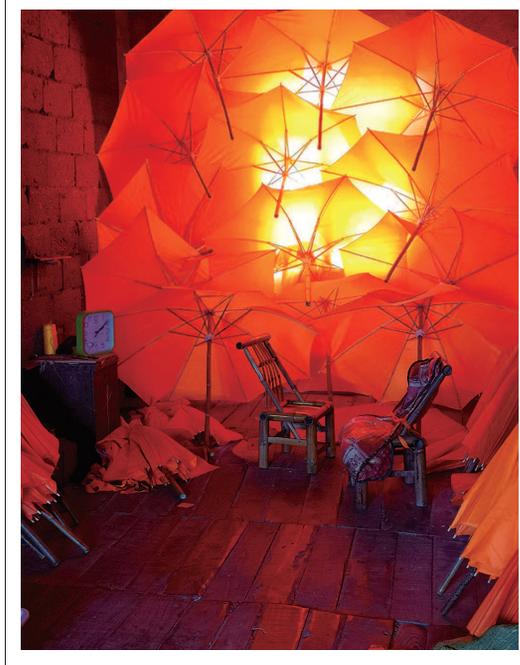
作为晚辈,我得蒙郑先生暨教员的印象并不算多,但每一次都铭感于心,留待细细反刍。拙译《志在摩登》付梓后,我冒冒失失地持书请郑先生赐教。对我的唐突之举,先生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兴致很高,为我开了将近两小时的小灶,甚至具体到译文中如何理顺关系从句的逻辑顺序这样的细节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拜见先生。一日之参商,阴历之永诀。

得知郑先生走的那晚,我彻夜难眠,于是披衣起身,写下一首五百字的五言挽诗,其中有句曰:“公亦申江老,我亦申江客。愿逐公项背,译海从容涉。”郑先生去了,将连贯中西的接力棒传给了我们,吾辈虽然稚气未脱,学殖尚浅,但定会积渐素养,锤炼译功,在这个诡谲动荡的世界,做好中西文化之间的津梁。我虽自知天资驽钝,但甘愿沉酣楮墨,黄卷青灯,循着先生的步履踽踽前行。

今当先生辞世周年之际,我再度为先生寄上一支挽歌,盼先生的道德文章永远泽被后世。其辞曰:郑肃逸文,克明峻德。鲁直守真,译溉东国。天脱桎梏,纵此译才。青灯荧然,百帙书来。门下三千,阶前五柳。操觚半世,松云一臆。先生诲我:译理贵通;博识就善,莫醉浮荣。闻此愧背,自嗟薄陋。维冀愚生,毋惭肯构。我谓公健,遐龄不违。孰知别后,泰山竟颓。人代冥灭,幽墟漠漠。天地不仁,眼枯难遇。俯仰生世,大梦遽空。惟其懿范,永续嘉声。响影犹在,何悲之用?滂泪陈辞,唯心之痛!

## 听一楼钟亘古寒

杨世祥



安徽的泾县,就是那个出文房四宝宣纸的地盘上,有家孤峰油布伞厂。油布伞,现今四十岁以下的中年人,多感陌生或未见过。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吧,上海城镇和农村人的普通雨具。它的伞骨用竹子构架,伞面是在染黄色的帆布上,再刷上几遍透明的桐油,能拒雨防渗,甚至能抵挡密集暴雨。

彼时,二三元一把,使用三五年乃至七八年,伞骨少见断,伞面不渗水,厚实耐用。唯一不足的是,体量粗壮,身軀过重。如果说,现今各式多姿多彩的伞是细皮嫩肉、体态轻盈的姑娘少妇,那么,半个世纪前的实惠实用的油布伞,则是那个经得起大风暴雨的粗壮中年汉子。如今,街市上曾经的油布巨伞,早已演化为广告伞,此外还有多少场合会有人青睐这位淘汰在即但还想争一席之地的厚道大叔呢?现在你有把黄油布伞的话,大

## 七夕会

踏进这家先是社办厂,后是村办厂,现被市场冷落的私营厂,厂房已近风烛残年。今天是周四,厂里只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制伞工兼接待员。旧损的二楼工坊,几间将告退休的场景教人苦涩和无奈。且慢,照片上的这间工坊,却给了我响起一声春雷般的意外:工匠们将十多把黄金置于窗口,透进的亮光,使伞面色彩竟有了魔术般的异变:窗光透见出清晰伞骨,伞面呈白间淡黄;而墙体映伞部分则成透色亮红。如果忽视置于靠墙的几把油布伞还呈原黄色,这岂不成了光怪陆离的光变“特异”功能?秀美了其貌不扬的油布伞!丑小鸭变天鹅乎!

是孤峰油布伞厂工匠们的独特见地,抑或是经他人点拨所设?我无意探问,有这般化普通为神奇的升华之美,就足够了!

## 摄影

